

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错误

荣开明 钟荣尧

一个真诚的革命者总是力求自己的认识正确, 自己的行动有利于革命事业, 有利于社会进步。但在现实生活中, 不论是普通的革命者, 还是功勋卓著的领导人物, 却又往往由于认识上的失误, 而导致行动上的错误, 给革命的事业、给社会进步的事业, 造成程度不同的损失。这样, 就产生了一个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错误和对待错误的问题。本文拟从认识论的角度, 对这个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一、错误是难免的又是可免的

人们认识的真正任务和目的, 就是要力求正确地解决主客观之间的矛盾, 达到主客观的统一, 从而求得真理, 卓有成效地去改造客观世界。但是, 人们在追求、探索真理的过程中, 又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任何政党, 任何个人, 错误总是难免的”。^① 必须指出, 我们这里所说的错误是指的主观认识歪曲地反映了客观实际, 主观同客观不相符合、不相一致。这种认识上的错误与社会生活中人们由于道德败坏、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等原因而造成的错误, 虽可能有联系, 但却有本质的区别, 不能混为一谈。

为什么人们在认识和探索真理的过程中, 错误总是难免的呢? 这是因为“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 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 不是‘抽象的’, 不是没有运动的, 不是没有矛盾的, 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 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② 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 由于认识客体、认识主体的局限和认识过程的复杂曲折, 往往使得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的符合、一致需要一个主客观矛盾运动过程, 因而在这个过程中, 错误往往是难于避免的。下面我们分别地作些具体分析。

第一, 从认识的客体看, 客观世界的事物是处在纷繁复杂的相互联系中的矛盾统一体, 具有无限多等级的本质, 这些本质往往隐藏在复杂多变的现象背后, 甚至被假象所掩盖, 事物本身的矛盾及其本质有一个逐渐发展暴露的过程, 人们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当事物的矛盾及其本质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的时候, 任何人要想一下子认识清楚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 是不可能的。但是, 人们又不可能也不应该等待事物的矛盾及其本质完全彻底显现出来之后再去认识它。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的认识就难免会犯错误。人类认识史上的大量事实表明, 当客观事物的矛盾及其本质尚未充分暴露时, 人们往往正在陶醉于某一眼前胜

利的时候，却又发生了出乎意料的结果，甚至把第一次胜利取得的成功也给取消了。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③可见，客观事物的矛盾发展是极其复杂的，当人们只看到某一方面，而对另一方，或者由于客观矛盾本身还未充分展开而无法预料，或者已有端倪而未察觉，或者视端倪为全貌时，都可能导致错误。

第二，从认识的主体看，人的思维“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④这就告诉我们，每一时代的认识主体——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个人都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人们的认识总是社会的认识，在客观上要受物质生产条件的限制，要受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⑤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极端低下的条件下，人们面对种种自然现象无法解释，因而不能不出现原始的宗教和图腾崇拜。在科学领域里、在没有天文望远镜和显微镜的条件下，人们的认识，大超不出银河系，小越不过微粒的历史时代，也就不可能不得出天圆地方说和原子不可分割的错误认识。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生产规模狭小的国度里，也很可能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解打上某些小生产者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烙印。例如，取消按劳分配的绝对平均主义，超越生产力发展实际水平的“穷过度”，等等。

其次，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认识是受阶级的影响和制约的。不同的阶级，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基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对于同一社会事物就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不同方针和方法。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其阶级本性往往驱使他们不能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敢正视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歪曲事实，导致行动上的错误。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它的阶级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决定无产阶级有可能认识、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进而认识、掌握和运用一切客观真理，达到阶级性和真理性的高度统一。但是，作为构成这个阶级的具体成员来说，即使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政党的成员及其领袖人物也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旧社会其他剥削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尤其是象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是封建专制统治几千年的国家，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旧的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根深蒂固。这些社会的和历史的因素，不能不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⑥即使是伟大的革命者有时也难免。长期残存在我们党内的家长制的领导作风，就是封建家长制思想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种封建家长制的思想作风、领导作风同党的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有了封建家长制的领导作风，就不可能真正发扬民主，认真地倾听同志们的意见和群众的呼声，做到正确地集中，这样，作为一

个领导者所决定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就难免要违反客观实际情况而犯错误。

再次，人们的认识还要受“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⑦肉体状况的限制，主要是指认识的生理条件的局限。健康的身体、正常的感觉和思维器官是认识起码的物质基础。人的体质以及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的状况当然对人的认识有重要影响。在认识过程中，由于身体和生理方面的限制对客观事物发生错觉和幻觉，从而产生错误，这是常有的。人们由于体质状况、年老多病使反映能力迟钝，感觉、思维器官失灵，丧失了正常的感觉和判断事物的能力而犯错误也是常见的。

精神状况的限制，除了上述时代局限、阶级局限以外，是指文化知识水平、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正确的思维不仅需要丰富的感性经验，而且要掌握科学思维的规律，讲究思维的技巧，进行科学的抽象。外行其所以领导不好内行，重要原因之一，是在上述诸因素方面，特别是文化专业知识方面，外行和内行有重大差别，外行的局限性更大。

第三，从人类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看，认识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无限发展过程。在这个复杂曲折的“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的无限认识过程中，“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⑧就是把人们引向错误的认识论根源。

回顾几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在认识过程中容易产生的错误，是多方面的。概而言之，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形：

主观性，把“外来成分”强加在客观事物身上，这是导致认识上的错误最常见的现象。

片面性，由片面性引起的错误更是屡见不鲜的。

割裂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分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过程中，最易于把人的认识引入歧途的重要一环。

不顾真理的界限，无限夸大真理的应用范围，真理就会转化为错误。

如此等等，还可列举一些。

全面地分析认识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局限性，充分地认识错误是难于避免的，是在认识论上坚持彻底的辩证唯物论的体现。马克思主义者承认错误难于避免，决不是为错误辩解，也不是因犯错误而心安理得、无动于衷，更不是说人在犯不犯错误的问题上象“宿命论”者所宣扬的那样完全无能为力。马克思主义者在承认人类认识发展的永恒运动过程中，以及一个人认识发展的全过程中，错误往往难于避免的同时，又认为只要我们真正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实践，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对某些具体过程中具体事物的认识，其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人的认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与实践密切相联的深刻的能动的反映，社会实践不仅改变着客观世界，而且改变着人的主观世界——人类认识的能力。在社会实践的发展中，人们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生活经验不断丰富，眼界不断扩大，人类的认识能力也不断提高，世界的可知性和人类的特殊的主观能动性，就决定了错误有可免性的一面。我们前面分析错误有难免性的一面，也正是为了找出认识过程中产生错误的根源，注意容易失足的地方，防止错误的产生，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错误。

哪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呢？就社会现象而言，可否概括为下述三种情况：（1）对诸如人要吃饭、穿衣；人类社会要继续生存并求得发展就不能不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在目前生产力发

展水平下，我国粮食亩产很难上万斤，等等，经过人民群众千百万次实践证明，一目了然的道理和简单事实的认识，只要具有基本常识，尊重简单事实，此类认识的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2) 别人或本人曾经吃过苦头，付出高昂代价，反复犯过多次的错误，尽管在改正错误的过程中仍有反复曲折，但只要认真总结，及时回头，不一犯再犯是可能的。

(3) 由于错误的发展，总有一个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体，从量变到质变的逐步激化过程，只要我们在犯了小的局部的错误的时候，能够边实践边总结边改正，力争不犯严重的、长期的、系统的错误也是可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因而“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这些错误“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一整套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方法，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又在总结几十年经验教训，尤其是在认真总结十年浩劫期间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到避免严重的、长期的、系统的错误是完全有可能的。

错误的“难免”与“可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可免”中常常存在着“难免”的因素，“难免”中又往往存在着“可免”的条件。尊重群众、尊重实践，谦虚谨慎、努力学习、认真总结，难免的错误可能犯得少些、小些，即使犯了也纠正得快些；反之，可免的错误，不仅可以一犯再犯，还可能发展得更为严重。长期以来，我国理论宣传中往往只讲错误难免，不讲错误可免，不讲“难免”和“可免”的辩证法，以致使得一些同志出现了本来可免的错误时，也用“难免论”作遁词，不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使得某些本来可免的错误，如共产风、暗指挥、片面化、绝对化、简单化等等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林彪、康生、陈伯达和“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目的，更是把这种片面认识推向极端，鼓吹现代迷信、神化领袖人物，使得一些本来可免的错误不断发生，某些开初还是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恶性发展，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带来许多不幸。沉重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全面地看待错误的“难免”和“可免”，在“难免”中寻找“可免”的条件，在“可免”中注意“难免”的因素，不断提高对错误作斗争的自觉性，就有可能做到“不故意犯错误，不重复错误，不犯严重的、一贯的原则上的错误与少犯错误。”^⑩

二、错误是坏事又能变成好事

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错误也有两重性。”“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⑪犯了错误是件坏事，但经过努力，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变成好事。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切身的利害关系，人们往往对错误的危害性、破坏性、坏的

方面比较容易认识清楚，而对错误可以从反面教育我们，变坏事为好事，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说，错误也有建设性的一面，却往往不大容易认识清楚。因此，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尤其是犯了错误，受了挫折的时候，深刻地认识错误的两重性，特别对错误能够变成好事的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说错误能够变成好事，是很好的教员呢？这是因为：

第一，错误可以刺激、启发人们积极地思考问题，从反面使认识主体（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个人）受到更深刻的教育，从而做到比较正确地认识事物。

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犯了错误，在实践中碰了壁、遭受了挫折和失败，就会给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带来痛苦，这样就会从反面以尖锐、鲜明的形式向人们提出问题，迫使人们开动脑筋从错误和挫折中想一想为什么会犯错误？产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如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朝着正确的道路上迅跑？从而打开思路，开阔眼界，从错误中寻求正确，从失败中求得成功。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说错误可能使人变得聪明起来，从中吸取教训，增长知识。人们在经受了错误和挫折以后，就能渐渐学会比较全面地正确地思考问题，从而取得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失败是成功之母”。

正面的、成功的经验诚然可以教育人，但错误的、反面的东西对人也有教育作用，而且往往能够起到正面教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⑪只要认真学习，善于总结，每个错误和挫折对认识主体都是有教益的。错误和挫折能使革命人民提高警觉、醒悟起来，人们经过正确和错误、成功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的锻炼和比较，会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大大增长才干，并且获得政治思想上的免疫力，从这一特定意义上说，不论个人还是群众，阶级还是政党犯了错误的，比没有犯错误的，在某些问题上可能会进步得更快些。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⑫人的认识，只有在正确和错误，成功和失败，正面和反面的比较中，才能准确迅速地把真和假、善和恶、美和丑、香花和毒草，加以区分；才能更好地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作出科学抽象，抛弃主观认识中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因素、成分或部分，求得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正确认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要正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⑬这是恩格斯从人类历史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一条“痛苦的真理”。我们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曾经犯过多次严重的错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才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从而经过斗争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阶段后，我们党同样走过曲折的路，翻过跟头，发生过多次重大的失误和挫折，从这些失误和挫折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才能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把革命和建设引向胜利。从这一痛苦教训中得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已经在粉碎“四人帮”后三年来的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定将在蓬勃展开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更加巨大的威力。

第二，在人类认识中有些理论就其整体看是错误的，但其中又可能包含有某些合理因素，对人们的认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参考价值。

人类的认识是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是个人的智慧和群众的智慧，当代的成就同前人的成果相结合的产物。人类认识史表明，有不少科学的理论和学说的创立，就是从批判错误的观点和理论中吸取了它们的合理的有益的东西而建立起来的。化学上曾经统治一百年的燃素说，虽然它的基本学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错误的，但是燃素说实验中积累的材料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恩格斯在谈到这一点时说：“在化学中，燃素说经过百年的实验工作提供了这样一些材料，借助于这些材料，拉瓦锡才能在普利斯特列制出的氧中发现了幻想的燃素的真实对立物，因而推翻了全部的燃素说。但是燃素说者的实验结果并不因此而完全被排除。相反地，这些实验结果仍然存在，只是它们的公式被倒过来了，从燃素说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用的化学语言，因此它们还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④众所周知，黑格尔的哲学就其整个体系而言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十分肯定地认为，研究辩证法，必须从黑格尔着手。因此，他们对黑格尔哲学都是采取扬弃的态度，抛弃其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取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可见，有许多错误的思想和理论，常常是人类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一个部分，其中往往含有某些合理的可资借鉴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错误是人类认识过程的必经环节，是整个人类认识宝库中的一部分财富。“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否认错误在探求真理道路上的积极意义，就不懂得真理的可贵。

三、重要的是促成错误向正确的转化

错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由坏事转化为好事。但是要把这种转化由可能变成现实，“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⑤

什么是促使错误向正确转化的必要条件？怎样遵循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促成错误的转化？这里主要就社会领域中错误转化的条件谈些看法。

首先，要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服从实践的裁决，服从群众的裁决，敢于承认错误，敢于公开地、如实地揭露错误，充分地认识错误的危害性，这是促使错误向正确转化的前提。对错误采取不承认主义，或者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就一定既不能认识错误，也不能纠正错误。

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待党的错误要采取这种态度，无产阶级革命者个人对待自己的错误也应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就表明我们党是一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严肃认真、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

其次，要着重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和环境，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能力，找到克服错误的正确办法。

在实事求是地公开承认和揭露错误的基础上，要对错误产生的原因、时间、地点和环境作出客观的具体的分析。既要具体分析错误的性质、错误的客观效果和犯错误时人们的思想状况，也要具体分析产生错误的具体原因和环境，而不要过多地去追究犯错误者的个人责任，

但这决不是不分析和研究个人的错误，更不是为个人的错误推卸责任。只有在对错误作出以上的具体分析之后，才能区别出那些错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那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那些错误是由必然的原因造成的，那些是偶然的原因造成的；那些错误应该由整个集体、整个党承担，那些应该是个人（包括领导人物）的责任，从而正确地、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用以教育整个党、整个阶级和广大群众，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

第三，对错误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

必要的斗争是实现错误向正确转化的重要条件。但是，斗争必须视其错误的性质、错误的程度和影响的大小而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恰当的方式。

对待人民内部的错误，我们党历来采取的正确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一看二帮”，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既允许人犯错误，又允许人改正错误，并且给人以改正错误的条件和机会。对犯错误者进行批评帮助时，既注意外因（外部条件），又特别注意调动其内因（内在的积极因素），使其诚恳地、虚心地向别人接受别人的批评帮助，严格地解剖自己，敢于正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

总之，实现错误向正确转化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必须具体错误具体对待，不能简单粗暴，一刀切；更不能象王明、林彪、“四人帮”那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方面，我们党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是极其丰富的，我们必须认真吸取，正确运用。

*

*

*

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错误的问题，是每个革命者都不能回避的极其严肃的原则问题。我们党在过去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在如何认识和对待错误的问题上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只要我们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自觉地运用到实际斗争中去，我们的党和革命人民就一定能够更加团结一致地勇往直前，无往不胜，人民的事业就一定能够进一步兴旺发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在本世纪末实现，更加美好的未来必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9页。

②⑧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411—412页。

③⑤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971年版，第158—159、219、33页。

④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83—8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页。

⑨ 刘少奇：《人为什么犯错误？》

⑩⑫⑮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5、416、398页。

⑪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5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页。

⑯ 《列宁全集》第31卷，第39页。